

论魏晋自然观

“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

章启群 著

章启群——主 编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014005752

章启群——主 编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

论魏晋
“中国艺
章启群 著

B235.05
08



安徽教育出版
社



北航

C1693290

B235.05
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 / 章启群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章启群主编)

ISBN 978-7-5336-7319-2

I. ①论… II. ①章… III. ①古典哲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35.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0474 号

书名: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

作者:章启群

LUN WEIJIN ZIRANGUAN ZHONGGUO YISHU ZIJUE DE ZHEXUE KAOCHA

出版人:郑可

责任编辑:张利

责任印制:王琳

装帧设计:袁泉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3, 6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319-2

定价: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导 论 8

第一章 16

两汉哲学自然观述略
——以董仲舒、王充为中心

第二章 32

论王弼对《老子》自然观的超越

第三章 64

论嵇康哲学自然观

第四章 92

论郭象对《庄子》自然观的超越

第五章 120

论支遁逍遥义及其自然观
——兼论释道安时代佛教般若学之玄学化

第六章 146

论《抱朴子》的哲学自然观

第七章	167
魏晋哲学自然观的特征及其对于“中国艺术自觉”的意义	
附录一	187
魏晋玄学	
附录二	214
支遁“逍遥义”与嵇康养生说	
附录三	224
怎样探讨中国艺术精神	
——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几个观点	
附录四	238
中国美学：众里寻他千百度	
主要引用书目	252
主要参考书目	254
后记	256
再版后记	258

引言

一

中国文学艺术在魏晋时期发生了非常显著而又深刻的转变。

作为中国文学艺术主流的诗歌,在魏晋时期已经从形式上走出了先秦两汉的四言诗体,不仅五言诗(兴起于东汉)已经臻于完美,而且七言诗也逐渐成熟。曹丕的《燕歌行》就是七言诗的一个代表。文坛上群星灿烂,出现了像“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文学家。无论是曹操的《短歌行》,还是阮籍的《咏怀诗》;无论是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还是太康时期“文典如怨”的“左思风力”,无不都是感慨人生,直抒胸臆的率性之作。这一时期诗歌内容上的根本转变,就是从先秦的“诗言志”,走向“诗缘情”(陆机:《文赋》)。诗歌的职能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也是抒发个人情感的一种手段。这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种完全属于个人化的创作。

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诗、田园诗,诞生了大诗人陶潜,以及谢灵运、谢朓等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呈现出无尽的幽美和诗意: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谢灵运:《初去郡》)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农家的自然生活也具有浓郁的诗意: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陶渊明:《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这是外在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生活第一次被中国诗人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而表现的。^①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在诗人们的眼中,都具有灵动的生机、美妙的形象,充满着诗情画意,气象万千。所以,当时的文学批评家陆机描绘诗人的创作是: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文赋》)

① 虽然《诗经》和《楚辞》中早就有对于自然界花草鱼虫、山川河流的描写,但《诗经》是把这些作为“兴”的内容,《楚辞》是作为比喻和象征来表现的。自然事物在这里都不是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被表现的。

成诗之作，无不吟咏性情，玩味自然，感怀时事。^①

文学中另一主流——散文，在这一时期则表现出清峻通脱、自然隽永的风格。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写景散文，不仅拓展了散文的题材，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亦有独到之处。前者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很大成就，后者对佛教寺庙建筑的描绘十分精彩。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文本本身此时发生了质的转变。

二

魏晋时期的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音乐、书法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变化。

在绘画方面，出现了大画家顾恺之和陆探微等人^②；雕塑方面，出现了大雕塑家戴逵父子。梁思成先生说：“晋代有人焉，为中国雕塑史中一极重要人物，戴逵是也。逵字安道，风清概远，留遁旧吴，宅性居理，心游释教。且机事通瞻，巧拟造化。作无量寿木像，研思致妙，制定精锐，……此木像与师子国玉像及顾恺之维摩图世称瓦棺寺三绝。”^③属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雕塑，被认为“雕饰奇

① 可参阅本书第五章关于支遁山水诗的论述。

②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山水画的独立，起源于晋末。”刘大杰先生说：“汉代的图画，史书告诉我们壁画具多，其内容或为历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的肖像，或为孔子及七十二门徒的肖像。在这里有两点我们必得注意：（一）因其题材可以知道汉画是儒家伦理观念的表现，是封建社会对于帝王圣贤的崇拜。（二）因其为墙壁的装饰品，可以知道图画还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但到了魏晋，无论题材作用都变了。其改变与文学的变动是一致的步调。那便是由伦理的趋于个人的，由现实的趋于玄虚的，由实用的而趋于艺术的了。由古人的记载，留下了许多画目。在那些名目里，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

③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伟,冠于一世”。^① 宗白华先生称:“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閤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② 音乐方面,嵇康的广陵散(琴曲)堪称绝唱;而书法艺术,在王羲之父子的身上,可谓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艺术典范。^③

而更为可贵的是,人们创造艺术的动因,从外在现实的生存的需要,转变为抒发内在思想情感的需要。宗白华先生说,这一时期人们“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诗、书、画开始成为活泼泼的生活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④。这是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所发生的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变化。

从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上来说,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就是“初发芙蓉”的自然清新,代替了“错彩镂金”的华丽浓艳。这种转变,推动了中国人审美趣味的拓展和提升。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新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镂金错彩’是更高的美的境界。”“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那么有装饰性,而是一种‘自然可爱’的美。这是美学思想上的一

①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177页。

③ 宗白华先生说:“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表现。”又说:书法“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自的真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0~181页。)李泽厚先生说:“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士族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品遗迹。他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纵横’,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④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次大的解放。”^①钟嵘《诗品》记载，汤惠休论谢灵运与颜延年诗时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南史》亦有类似记述：“延之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延年终身病之。”由此可见时人对于清新自然诗风的崇尚和膜拜。

这种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和趣味范式，从而对于后来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带有规范性的深刻影响。宗白华先生说：

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②

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

魏晋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深刻变化，还表现在理论的形态上。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和艺术理论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顾恺之《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及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王僧虔等人的书论，等等。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这一时期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著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在后世也是罕见的。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被史家称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文艺理论著述。而像

^{①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187页。

《文心雕龙》、《声无哀乐论》、《古画品录》、《诗品》等,则是千古不朽的中国美学瑰宝,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中国文艺学和美学史上一种不可逾越的经典。

大量文学艺术理论著述的出现,表明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探求的迫切需要,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规律思考的深入。这种对于文艺自身规律的探索和思考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这种属于艺术本身规律的探究,与先秦两汉的文艺理论著述,比如《乐记》之类主要探讨艺术的伦理、政治等外在的标准,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南朝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是对诗歌形式规律的初步探索,为盛唐律诗乃至中国律诗的成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把艺术自身作为理论思考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表明了人们对于艺术作品自身价值和审美性质的空前觉悟。

在这种探索中,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和审美范畴,如“气韵”、“风骨”、“神”、“妙”、“隐秀”等。这些范畴和概念是当时人们品评艺术的标准,不仅表达了魏晋人的艺术理想和追求,还理论地展示了中国人审美视域的洞开和拓展。这是大量艺术美的创造和生活本身所蕴涵的美的发现的理论化形态,是魏晋人丰富的审美实践和美感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它标志着中国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审美意识,而且在理论上得到明确地表述和概括。这种美学理论的繁荣和成熟,与当时生机勃勃的文艺现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艺术景观。这些审美的范畴和观念,对中国的艺术和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

四

魏晋时期中国文学艺术出现的上述现象,被学界概括为“中国艺术的自

① 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个时代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更为后来文学理论和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觉”。^① 中国艺术在魏晋时期走向成熟、“自觉”，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基本共识。^② 而我们的问题则是：中国艺术为何在魏晋时期出现“自觉”？什么因素造成中国艺术的“自觉”？

毋庸讳言，造成“中国艺术自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还有艺术自身的因素，甚至还有民族交流的因素，等等。从我们对于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考察中，可以发现：

在魏晋哲学——玄学中，中国哲学自然观发生了一种深刻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魏晋哲学完成了一个丰富的审美主体的哲学建构，并由此展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审美世界的可能性。这是否可以说（至少在逻辑上）是“中国艺术自觉”的一个哲学基础和依据？或者说，是我们解释为何在魏晋时期中国艺术出现“自觉”的一个哲学的理由？

这就是本书所极力追问和试图回答的一个本源性问题。

① 这一说法应滥觞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而已集》。）李泽厚先生不仅赞同鲁迅这一论断，还说：“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谢赫总结的‘六法’，‘气韵生动’之后便是‘骨法用笔’，这可以说是自觉地总结了我国造型艺术的线的功能和传统，第一次把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在理论上明确建立起来。”“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我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1～102页。）徐复观先生也认为，中国艺术“到了魏晋时代，因玄学之力，而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引起了艺术的真正自觉”。（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页。）另，日本学者也有关于中国艺术自觉的说法，例如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称：魏晋时期是“支那文学上的自觉期”。这与鲁迅先生的论断可并行不悖。

② 张少康先生有关于文的自觉应在两汉的观点，参见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笔者所讨论的则不仅限于“文”，而是整个文学艺术。

导 论

一

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的观念,它的核心问题涉及对于自然存在物的看法和观念。因此,自然观的主要问题应该是:(1)自然是如何产生的?(2)何为自然?即自然的本质、本性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宇宙论;第二个问题涉及本体论、知识论。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然观亦可称哲学自然观。^①而属于自然一部分的人本身是什么,这应该也是哲学自然观所要回答的问题。不过,哲学自然观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的自然属性问题,亦可以延伸为自然人性的问题,这是哲学自然观与其他哲学学科(比如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之间应有的界限。当然,这个界限不是绝对的。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全部哲

^① 笔者认为哲学自然观的内涵至少有:第一,哲学中之自然观;第二,自然观之哲学层面的意义。本书主要在这两个意域内展开论述。

学的问题核心(甚至分析哲学也不例外)。

任何哲学自然观都是人对于自然的一种观念。所以,每一种哲学自然观本质上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西方哲学从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开始,就有关于自然的哲学观念。哲学史家认为,古代希腊哲学最初是对外在自然感兴趣,后来逐渐转向人本身,而带有人文主义的性质。所以,哲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自然,因而什么是人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人类,因而什么是自然?由自然到人类这一兴趣的转移才带来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从而出现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①

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方式,与西方哲学不完全相同,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但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也有很多关于自然的思考和观念。从这一点来说,东西方哲学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不过,中国哲学自然观有它特定的观念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哲学里,关于自然观的思想,常常表现为一些特定的范畴和命题,比如“道生万物”、“有生于无”等,涉及“自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而关于“道”、“无”、“气”、“玄”等,涉及“自然的本质和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像人性善恶等,就涉及“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的问题。

然而,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自然观注重自然的客观性质和本体的探讨,古代中国哲学自然观则更关注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自然事物的整体结构和规律,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等整体性问题。^②中国哲人认为,自然之中存在一种和谐的运行法则。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老子》中“道法自然”的思想,首先就是肯定客观自然界存在一种和谐的规

① 见梯利(Frank Thilly):《西方哲学史》上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0~21页。关于西方哲学自然观的学说,还可参阅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② 西方哲学也探讨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关系。但是,第一,它更关注自然本身的本体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第二,就单个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大多是讨论自然本体论以及认识论问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譬如梯利所言,在西方哲学中,常常是就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趋势来说的。

律,而万事万物包括人为的活动都必须遵从这一规律。因此,从自然的运行法则,中国哲人引申出社会的运行法则,以及人生应有的处世法则甚至人生态度。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自然观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自然观亦可称为中国哲学的“自然”观。

中国哲学自然观的这一特点是与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一致的。中国哲人很少有对于客观事物本身(本体)进行无穷追问的兴趣,也很少有对自然和人生脱离社会生活的超验思考。他们的兴奋点主要在国家社稷和个人之安身立命,偏重于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之学。所以,中国哲学自然观虽然以自然及自然事物作为问题的起点,但目的是社会和人事,是以人的社会生活或个人生活作为依归的。从上古时候起,中国就有人以天为则的思想。《诗经》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雅·皇矣》。帝,指天帝,也即天)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都是从哲学自然观引申出来的政治哲学观念。而《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则是由此得出的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内在规律。所以,中国哲学自然观,就不仅仅限于关于自然界的看法和观念,还会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政治、伦理、艺术、文化等很多方面。

当然,上古时期的则天思想与原始宗教和天命论相混杂,甚至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中,也具有明显的天命论色彩。^①从某一方面说,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发展过程,正是摆脱这种天命论的过程。

二

魏晋时期,中国哲学在“有无”、“本末”、“体用”、“自然与名教”、“圣人有情”

^① 关于《老子》自然观与原始自然主义及天命论之间的关系,详见本书第二章。

等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讨论。这里面有比较集中讨论关于自然观方面的问题。

在先秦哲学家的观念中,“自然”一词不仅是指自然的事物,而且指自然事物的本来存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概念具有一种规律和法则的内涵,体现了一种必然,又表现在偶然中。客观事物的生成、发展,就是这个法则的显现。从万物的独立存在及其独立运行这一点来说,自然的意思就是“天然”、“本然”、“自然而然”,又可以说是“无为”。而人对于自然的改造活动就成为一种“有为”的活动。但是,如果人们顺应自然的法则,按照自然的规律进行的物质生产或社会活动,又是一种“无为”。这正是《老子》思想的精髓。所以,《老子》反对儒家积极入世、崇尚礼仪的思想。儒道之间的这种矛盾,在荀子的思想中得到一定的调和与综合。荀子一方面主张“天人之分”,即自然与人各有不同的功能和职能,另一方面提出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即人亦有能力与天地并列。因此,人的活动,能够达到与自然法相应的位置和功能。

先秦哲学自然观的这些观念和问题,在魏晋时突出表现在“自然”与“名教”的辩论中。如果说,在先秦的哲学自然观中,《老子》把自然的法则作为最高的法则,而把“人为”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荀子强调人与自然的并重,那么,在魏晋哲学自然观中,则把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规范调和起来,亦可以说是把《老子》的自然思想与孔子的尚礼思想调和起来,认为二者有内在的相通,或者说,在本质上就是一回事。这种思想用魏晋玄学的话说,就是“名教本于自然”(王弼),或“名教出于自然”(郭象)。而确立是否“自然”的标准,则是“理”。这样,魏晋玄学不仅肯定了社会的政治、伦理规范(名教)的自然合理性,同时也拓展了“自然”概念的丰富内涵,把先秦哲学“自然即合理”的自然观,转变为“合理即自然”的自然观。

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这一转变,从理论上说,就明确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和感性要求的合理性。这当然与魏晋人在生活的观念和境界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

三

魏晋哲学自然观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还可以说,是人怎样才能“自然地”生活,即人的“自然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转变中,我们实质上可以看到魏晋哲学家们对于自然和人性问题的超越前人的深刻思索,也可以说,实质上看到魏晋时期普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然的”人生,体现在魏晋人的理想中就是“率性的”人生,也即“潇洒的”人生。我们通常所谓的“魏晋风度”,就是这种人生的一种概括和写照。宗白华先生说过:“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①刘大杰先生认为:“魏晋人的人生观,……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这种人生观的特征,我们可以名为人性的觉醒。”^②而我们对于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考察,其根本着眼点正是在于魏晋人精神上的深刻变化。魏晋人在精神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宗白华先生说: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班]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③

我们从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角度来审视魏晋人这种精神深处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更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表象的内在把握——哲学的把握。魏晋人从率性自然,到自然深情,这是人性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1页。

②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③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